

Book Review

Thomas J. Mazanec, *Poet-Monks: The Invention of Buddhist Poetry in Late Medieval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4, 327 pp.

唐末诗僧群体的历史再现与诗学新探 ——评《诗僧：唐末五代佛诗之发明》

Thomas J. Mazanec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USA
mazanec@eastasian.ucsb.edu

Reviewer: 姬洁如¹

Jieru Ji

中国西南大学文学院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ina
j1394359328@163.com

DOI: <https://doi.org/10.5281/zenodo.14784796>

《诗僧：唐末五代佛诗之发明》(Poet-Monks: The Invention of Buddhist Poetry in Late Medieval China, 下文简称《诗僧》)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余泰明(Thomas J. Mazanec)的首部英文著作, 经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于2024年2月推出。此书着重探讨了在传统文学史书写中常被边缘化的双重维度: 一是边缘时期——晚唐五代, 二是边缘群体——僧侣诗人。在中国诗歌史上, 儒家男性精英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众多学者往往聚焦于这一群体的诗歌创作, 据此划分出主流诗歌的繁盛与衰落时期, 对晚唐五代等所谓的“衰落期”诗歌多抱有贬低之态。同时, 其他群体的创作也常惨遭学者的批判与压制。余泰明则突破此传统思维定式, 综合运用数字人文技术和文本细读等方法, 论证出诗僧群体在当时文学社会中的核心地位。他进一步辨析了诗僧将诗歌创作与佛教修行紧密结合, 推动中古诗歌创新的发展进程, 有力证明了晚唐五代时期是佛教诗歌成长、繁荣的重要阶段。这一学术取向与作者过往的研究路径一脉相承: 早在2021年, 他便牵头组织“最糟糕的中文诗歌”(The Worst Chinese Poetry)学术研讨会, 引入“糟糕的诗”“歪诗”“坏诗”等概念, 旨在提醒学界重新思考中国文学史。《诗僧》进一步彰显了余泰明关注边缘议题, 挑战传统范式的学术态度, 也为欧美学界的唐诗研究注入新的见解。

目前, 海外学界唐诗研究的中心聚焦于盛唐诗歌, 近年来有学者逐渐重视中唐诗研究, 但对晚唐诗歌的探讨仍相对薄弱。其中, 葛瑞汉(A.C. Graham, 1919–1991)《晚唐诗》(Poems

收稿日期: 2024-03-18

作者简介: ¹ 姬洁如, 西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of the Late T'ang, 1965) 的标题虽称晚唐时期，但书中译介杜甫、孟郊、卢仝、李贺等七位诗人的诗作并不完全契合此时代范畴。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 的《晚唐：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 (*The Late Tang: Chinese Poetry of the Mid-Ninth Century, 827–860, 2006*) 对晚唐诗风的转型与形式创新进行剖析，但其仍将此时期的作品视为一种僵化模式的诗歌。在中国文学史通史书写的代表之作《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00*) 与《剑桥中国文学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10*) 中，晚唐诗歌的论述所占篇幅也较为有限。对于佛教徒的研究，海外学者同样侧重于对寒山、皎然等著名僧侣的个体研究与作品译介。近年来，开始有学者积极探索佛教研究与中国文学的融合路径，如蒲杰圣 (Jason Protass) 出版《诗魔》 (*The Poetry Demon: Song-Dynasty Monks on Verse and the Way, 2021*) 一书，深入论述诗歌在宋代僧侣生活中的角色、地位。书中对僧侣文学社交性、宗教文献、诗佛关系的高度关注，为晚唐诗僧和佛教诗歌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

国内学界对晚唐五代诗僧的关注度相对较高。许多文学史著作会对该群体进行宏观背景式的介绍，郭预衡 (1920–2010) 的《中国古代文学史》 (1998) 则专设章节论述唐代僧诗与敦煌文学，对诗僧的文学成就有较为充分的讨论。同时，学界还存在大量有关贯休、齐己、灵一等个体诗僧的相关研究，如蒋寅《大历诗僧灵一、灵澈述评》 (1992)、温永明《诗僧皎然研究》 (2012) 等。这些文章多以考证为重点，探讨诗僧的生平事迹、思想及文学创作情况。诗僧群体研究的代表作则主要包括王秀林的《晚唐五代诗僧群体研究》 (2003/2008)、金佳敏的《晚唐五代诗僧普遍苦吟现象研究》 (2016)、查明昊的《转型中的唐五代诗僧群体》 (2006) 等。研究内容也多集中于文献的校勘与整理、诗僧群体的时空分布、成就和影响等层面，在方法论上略显单一。余泰明则在此基础上，还原诗僧所处的文化场域，通过定量分析等方法论述他们与主流文人间的动态互动，重塑了读者对晚唐诗僧群体的既定认知。

《诗僧》由导言、历史、诗学、结语四部分组成，共分六章。导言概括全书，梳理研究现状，明确研究目的与方法。第二部分“历史”下设三章，作者将晚唐诗僧置于广阔的历史、地理、社会语境之中，运用数字人文技术系统追溯他们起源与发展，揭示他们进入文学传统的演变历程。第三部分“诗学”同样涵盖三章，通过细读文本，作者察觉诗僧将佛教实践中的否定性哲学、咒语逻辑、冥想体验融入到了诗歌创作之中，促进文学与佛教的深度统一。结语继续拓展，明确佛教诗歌新观念未稳固立足的原因，讨论诗僧群体如何逐渐式微，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注脚。全书整体上采用宏观脉络梳理与微观文本阐释相结合的方式，关注仕与僧、诗与佛的多维互动，综合探讨晚唐五代诗僧的文化价值，重新思考了文学与宗教之间的复杂关联。

一、数字人文：锚定诗僧于文学史的动态坐标

《诗僧》中的一大亮点在于作者敢于突破传统文学研究范式，深度应用数字人文方法。近年来，随着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Project, CBDB)、地理信息系统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等基础数据库的不断完善，众多学者开始探

索数字人文与传统文学研究的融合路径，并取得了系列成果。如李友仁（Paul Vierthaler）作为荷兰莱顿大学数字人文中心的创始人之一，在数字人文领域造诣颇深。他精通文体计量学（stylometry）、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等数字技术，已将这些方法广泛应用于明清时期的印刷文化与历史、文类分析以及作者身份研究等多个领域。蒲杰圣则在他的文章中融合了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分析技术与传统的文献研读方法，针对宋代禅宗住持的分布情况进行探讨，描绘出了宋代宗教谱系的动态演变脉络。这些学者能够充分关注文学文本与宏观历史，综合运用多元算法，为文学研究构建起一套精细化、系统性的分析框架。

这些学者与余泰明交往密切，也为《诗僧》提供了很多建设性意见。在书中不难发现余泰明对上述提及的研究理路方法的学习与运用。他精准选定 48 位诗僧及其乐府、歌行体等古典诗歌作品作为研究重心，借助地理信息系统、正则表达式（RegEx）及社交网络分析等技术，快速处理庞大的文献数据，从而生动展示晚唐诗僧的历史地位、活动轨迹与文学贡献。

首先，余泰明多次运用文献量化研究方法，关注诗僧与文人间的交游酬唱，有力地论证了诗僧于当时文人社交网络中的核心地位。与之相对，在传统研究中，学者虽能通过列举大量文献推断诗僧与文人交往现象的普遍性，但往往将此结论用于诗僧文学的内部研究，把群体间的交往归结为诗僧诗歌发展进步的重要因素，并依赖文人对诗僧诗歌的评价来证明诗僧在诗史上的重要地位。这种定性分析侧重于经验描述，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色彩，难以精准还原诗僧的历史地位。余泰明则首先通过比较特定文人与数据库中全体文人给僧侣寄诗酬唱的数目与频率，发现二者基本一致，直接体现晚唐文人与僧侣间互动交往的普遍性。他进而运用中介中心性概念进行计算，点明贯休、齐己等僧侣在社交圈中的排名较为靠前，客观地确定他们在晚唐文人社交网络中的关键地位。同时，他依据数据资料绘制了晚唐五代诗歌交流的网络图谱，清晰呈现出僧侣群体的广泛分布，齐己、贯休等关键诗僧周围线条密集交错，充分证实了他们在社会文化场域中的中心地位。

其次，余泰明运用地理信息技术绘制出了晚唐诗僧在不同阶段的地域分布图，通过可视化分析，展示出诗僧在唐末的动态历史发展轨迹。这些地图不仅从空间层面清晰地描绘出诗僧的迁徙与分布，还通过象征诗僧的圆圈大小，直观反映出诗僧群体在不同区域的聚集规模与持续时间，从而完整展示了诗僧如何从江南地区的特定群体，在黄巢起义后逐步成为全国多个地区的文化焦点。这种设计打破了传统以时间为轴心、聚焦地域流派的文学史研究范式，开创了时空结合的新视角，将诗僧群体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有助于读者梳理诗僧的演变轨迹，并深入探究其背后的历史动因。

此外，在诗学技法分析层面，以往学者常通过研读文本对诗僧的创作风格进行笼统概括，多以奇崛怪诞、清幽冷峭等表述来形容。余泰明则借助计算机统计特定词汇在诗僧作品中的出现频率与搭配情况，更为精准地概括出诗僧的诗艺特点。通过计算研究，余泰明发现贯休、灵澈等诗人的作品中频繁采用重复相同字符的手法，其运用频率不仅超越了《全唐诗》的平均水平，而且他们对复杂型和简单型的重复手法表现出明显的使用偏好。计算结果还表明部

分诗僧作品的押韵比例也大大超过唐代诗歌常见的 50%。这些具象数据分析，清晰地展现了诗僧在韵律、语法层面的诗学创新，增强了论证的说服力。

二、诗统思辨：身份差异下仕与僧的对立互动

在确认诗僧的社交核心地位后，余泰明进一步深入文人与僧人之间的复杂互动，着重关注他们对佛教诗歌与儒家诗学传统关系的理解。于历史文本的重新梳理之中，揭示出诗僧群体被逐渐“边缘化”的动态历史过程。

首先，主流文人拥有显著的话语权，其审美倾向与文学评判深刻影响着诗僧群体的发展轨迹。八世纪中叶，文坛偏爱清新超逸、意境悠远的诗歌，这为诗僧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席之地。在地方文化圈中，诗僧几乎完全依赖于与文人的交往互动，以及获取他们的文学赞誉来树立自己的诗歌声望。然而，这些赞誉多源自于仕人对僧人身份独特性的好奇，他们惊叹在儒家传统诗歌领域之外竟有如此佳作。如独孤及在评价灵一的诗歌时，将其描述为“尘外”或“方外”之人（页 51），权德舆则认为灵澈言论之妙，非学者所能穷究。在文人主导的文学评价体系之下，这些言论在肯定诗僧诗歌价值的同时，也无形中给诗僧贴上了僧侶的身份标签，将他们隔绝于主流文学圈之外。九世纪初时，韩愈、柳宗元等主流文人秉持维护儒教道统纯正性的理念，为文学创作划定了严苛的边界。他们主张古典诗歌创作须与儒家文化结合，诗僧只是在宗教领域内模仿文人，其诗歌创作本质上应服务于佛教修行。基于此，主流文人强调文学与宗教的对立性质，形成了对诗僧的双重标准：若僧侶的诗作优秀，被视为背离了宗教修行的本分；若诗作平庸，则难以在文学领域获得应有的认可，使诗僧的创作处境变得极为艰难。

直至黄巢起义爆发，原有的文学秩序遭受重创，许多主流文人对诗僧的态度发生了显著转变。他们主动为诗僧写诗、作序，确立诗僧的诗歌传统，意图将其纳入主流文化体系之中。吴融高度评价贯休：“太白、乐天既没，可嗣其美者，非上人而谁”（页 97），李调对尚颜赞誉有加，称其“为后人宗旨也”（页 93），李咸用更是将贯休视为连接诗僧修睦与宋诗主流文学的桥梁。这些评价表明，文人已将僧人视为正统诗歌传统的积极参与者与继承者。正是在他们的肯定与支持下，诗僧诗歌迎来了繁荣发展的局面。而在宋朝建立之后，欧阳修等人为探索文学新路径，大力反对“晚唐体”，加上他们对佛教的淡漠态度，促使诗僧群体再度被推向文坛的边缘。自此以后，文学史在评价诗僧时往往将其与晚唐风格相提并论，或批判他们对佛教诗歌的创新尝试，使得该群体长期游离于主流之外。可见在诗僧的发展历程中，主流文人时刻掌控着诗歌价值的评判权，进而决定了诗僧在文学版图中的位置。

其次，余泰明也十分关注诗僧内部的演变轨迹，察觉到他们自身能动性对诗僧诗歌发展的积极作用。鉴于早期僧侶在外貌与行为表现上难以与主流文化相融合，他们便选择通过投身文人的诗歌创作活动，利用“诗僧”的身份标识，巧妙融入文人的社交网络，以此拓展自身知名度。例如，皎然、灵一、灵澈等诗僧与韦应物、独孤及、权德舆等人都有交往，刘禹锡更是点明灵澈的声名鹊起是得益于包佶、严维、李纾三位文人的高度赞赏。在处理文学与

宗教的关系时，早期诗僧展现出高度的灵活性，能根据不同情境调整其表达策略，迎合文人受众的接受偏好。在诗僧群体内部，他们倾向于相互赞赏并积极推荐。如皎然十分称赞灵澈的多才多艺，并通过为他作诗、撰写评论的方式，将灵澈引荐到东南部的主流文坛，有效扩大了诗僧群体在社会上的影响范围。在黄巢起义之后，诗僧意识到社会动荡已动摇了精英文化的基础，使得文化环境更具变动性。因此，他们四处游历，积极连接不同社群，旨在建立新的文化中心，增强诗僧群体在文学活动中的合理性。与此同时，诗僧内部也致力于协调宗教与诗歌实践的关系，形成自身的佛教诗歌发展脉络。贯休在《览皎然集南卿集》中梳理出从宝月、皎然再到周鹤直至自身的诗僧文学传承，齐己则在这一基础上壮大诗僧群落，着重强调诗僧群体的历史传承性。然而，当北宋禅宗修行者崛起后，禅宗戒律日益规范化与严格化，僧侣开始认为诗僧群体偏离了正宗的佛教修行路径。因此，《禅苑清规》《续古尊宿语要》等著作公然对诗僧的行为进行排斥，导致诗僧的佛教读者群逐渐萎缩，使他们最终被推向了边缘位置。

综上可见，文学史在本质上呈现为一种流动的发展面貌，绝非静态固化的既定模式。就诗僧群体而言，他们并没有始终处于边缘境地，而是在社会转型、文化思潮及宗教因素等多重力量的影响下，经历了一段复杂的地位变迁过程。作者于描述中也试图表明，晚唐时期文学与宗教、主流文化与边缘群体也在不同阶段里相互影响，呈现出复杂的互动样态。

三、援引经文：剖析诗与佛意蕴的交融统一

在过往的研究中，学者普遍将宗教概念化为一种世界观或信仰架构，侧重剖析文学作品如何体现这种信仰内涵；同时，他们常认为晚唐五代的诗僧创作是宋代“以禅论诗”思想的前身，将其间诗与佛的关系解读为依附性或隐喻性的联结。余泰明则另辟蹊径，将宗教视作一种生动的实践形态，并通过解读诸多宗教文献，揭示诗僧如何展现诗歌创作与佛教实践之间的平等相融之态，用宗教推动诗学创新。

大量佛教经典与敦煌文献在书中被详细论述，能直观还原出诗僧们创作的佛学语境。作者提到《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大般涅槃经》，发现其中存在大量有关无我、涅槃、空性等否定表达。他节选翻译了《法华经》《悉昙颂·(其八)佛说楞伽经禅门悉谈章》中独特的咒语形式，点明弘忍的《守心要论》及洪州禅祖师马祖道一的经文中的冥想思维。这些经文在当时已然广为人知，是诗僧投身佛教修行必然会接触到的核心理念。基于这样的宗教文化背景，作者未采用传统诗学审美的视角来评判诗僧的诗歌价值，而是洞察诗僧如何积极运用日常接触的佛教资源，以推动诗歌技巧创新。其中，神彧在他的诗学技法著作《诗格》中巧妙融入了佛教的四种否定形式，齐己、贯休等僧侣则在诗歌创作中将否定性传统升华为一种富含层次感的重复美学。他们进一步将经文咒语中的运作机理、独特音律以及异域风情等元素，借助重复、押韵及陌生化等艺术手法融入作品之中，试图促进诗歌与宗教的融合。这些异域文献进一步为诗僧诗歌创作能够服务于佛教实践提供了有力证明。以贯休的《贊念法华经僧》为例，作者通过对其原始手稿的分析，并结合上下文，发现该诗在当时为宗教仪式的

一部分，对僧人具有实际应用价值。齐己的《赠念法华经僧》中密集的韵律、对诵念经文逻辑和效力的生动描述，在听觉效果上与宗教咒语具有相似性，能让读者从聆听中感受到异域的精神力量。

同时，余泰明注意到诗僧推动诗歌与佛教融合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他们会从主流文学传统、佛教语境以及与前辈文人的互动中汲取养分，逐步创造出一种新的佛诗理念。在《诗僧》第六章中，关于诗歌与冥想关系的论述清晰地揭示了这一发展过程。回溯至中国传统文学，陆机的《文赋》倡导创作诗歌时的沉浸状态，晚唐时期贾岛的苦吟美学与之相呼应。它们核心理念又与佛教的苦行主义有着惊人的相似，均着重于实践中的全然投入，贯休在诗歌中已然微妙暗示出两者间的关系。在佛教文化的影响下，主流文人逐渐在诗歌理论中提倡佛教冥想中的专注精神，刘禹锡更是阐述了冥想与诗歌之间的内在联系。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齐已在诗歌中明确表达出冥想与诗歌创作之间的同源性质。他不仅通过“坐卧与行住，入禅还出吟”（页208）的诗句，强调吟诗与冥想可以并行不悖，更在《寄郑谷郎中》中直接指出“除此二门无别妙”（页205），强调诗歌创作与冥想本质的相通之处，从而推动了佛教诗歌的创新与发展。

结语

总而言之，《诗僧》一书重新评估了晚唐五代诗僧的文学史地位与诗学贡献。余泰明融合数字人文技术与文本细读手段，依托丰富的宗教文献，在书中深入剖析了文人与僧侣间的广泛交往，强调诗僧在社交网络中的核心作用，并勾勒出这一群体的历史演变轨迹。同时，该书深入阐述了诗僧在诗歌美学上的创新探索，点明他们能将古典诗歌与佛教的否定性哲学、咒语形式及坐禅冥想等实践相结合，推动了诗歌创作与佛教实践的和谐统一。

如同晚唐五代的诗僧一般，余泰明在此书中力图打破文学与宗教间的冲突，为文学史的重构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作者意识到传统研究常停留在对僧侣宗教信仰的单一解读，这种方法不仅难以把握历史人物的真实态度，还预设了宗教与文学为相互独立的实体，且在多数情况下呈现对立关系。所以余泰明选择从宗教实践的角度切入，考察诗僧在诗歌交流、遣词造句、打坐冥想等具体实践活动中行为表现，以及这些行为如何塑造其情感世界与信仰体系，作者由此找到了宗教与文学之间的融合路径。这种研究思路为后续学者探索其他宗教群体的文学思想提供了新的可行性，利于揭示经典作品的多重维度。

就文学研究方法而言，余泰明在书中对历史语境的高度关注，对文本细读方法的娴熟运用，均体现了北美汉学研究的传统理路。他在此基础上，引入数字人文技术，强化了文学研究的系统性与清晰度，真实再现了诗僧这一边缘群体的历史地位与演变脉络。这一实践表明，数字技术能够与传统研究方法相辅相成，让学者改变对文学史的既有认知模式，揭示常被历史遮蔽的泛文本之声音。同时他在书中对定量分析、社交网络系统等具体技术的运用，为学者今后在拓宽文学史研究领域方面提供了明确且可操作的方法论范式。

参考文献：

- Graham, A. C. (1965). *Poems of The Late T'ang*.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Ltd.
- Liu, Chao-Lin, Thomas J. Mazanec and Jeffrey R. Tharsen. (2018). Exploring Chinese Poetry with Digital Assistance: Examples from Linguistic,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Viewpoints.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5(2): 276–321. <https://doi.org/10.1215/23290048-7257002>
- Mazanec, Thomas J. (2018). Networks of Exchange Poetry in Late Medieval China: Notes toward a Dynamic History of Tang Literature.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5(2): 322–359. <https://doi.org/10.1215/23290048-7257015>
- Owen, Stephen. (2006). *The Late Tang: Chinese Poetry of the Mid-Ninth Century, 827–860*,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https://doi.org/10.1163/9781684174317>
- Protass, Jason. (2021). *The Poetry Demon: Song-Dynasty Monks on Verse and the Way*.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https://doi.org/10.2307/j.ctv1985wqz>
- Pettit, J. E. E., and Jason Protass. (2016). Mapping the Sacred: Geospatial Studies on Chinese Religions. *Review of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3(2): 145–147. <https://doi.org/10.1163/22143955-00302001>
- [荷兰]李友仁(Paul Vierthaler),宋迎春.(2018).北美与西欧的数字人文中国研究状况论析. *山东社会科学*, (7): 54–58+63.
- 王秀林.(2008).晚唐五代诗僧群体研究. 中华书局.
- 王兆鹏, 邵大为. (2020). 数字人文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初步实践及学术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 (8):108–129 +206–207.

(责任编辑：周睿 实习编辑：夏维阳、刘一弘)